《日本汉诗史》的汉诗史观：对“汉诗史”或“文学史”的自觉

《日本汉诗史》首先具有日本汉诗史的书写自觉。它对“日本汉诗史”这一文学史类别作了明确的定义。而这种定义，首先是通过和江村北海的《日本诗史》的比较得出的。

从本书的自序部分来看，作者菅谷军次郎接触过《日本诗史》。对于江村北海的著作，他的意见是：“它只能看作是日本诗话，不能够作为汉诗史构成、书写体裁的样板。（1）”

菅谷军次郎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。现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（Literature）和人文学科是在幕末，由思想家西周（1829-1897）年自英国引进的（日本文学史，近古，657），因此，在《日本诗史》编撰的年代，日本知识届并没有“文学”或“文学史”的概念，这部著作也不能被归入到作为文学史的汉诗史中。尽管从《日本诗史》的结构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江村北海对汉诗史中基本问题的解答，但在菅谷军次郎看来，北海并没有书写汉诗史的自觉。

此外，当时日本业已出版了许多日本文学史、中国文学史，可见文学史书写已然形成了基本的范式。从当前可考的目录来看，日本史学者三上参次（1865-1939）的《日本文学史》（金港堂，1890）是第一部影响较大的日本文学史。而至《日本汉诗史》成书之前，至少有50部左右的日本文学史出版，期间亦不乏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日本文学史，由英国外交家阿斯顿（W.G.Aston，1841-1911）撰写。至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，自十九世纪以来也有将近20部问世。

从以上近代日本的文学史出版概况来看，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就是最早的一批文学史大多作为高等学校文学科的讲义而印发的。因此，也可以认为，当时撰写文学史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配合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。此外，也有经由博士论文整理出版的学术论著。

菅谷军次郎又是如何对待这些文学史著作的？他举了冈田正之的《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》以及《日本汉文学史》两本著作为例，认为学位论文和课堂讲稿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（3）。恐怕是因为这两种作品在书写时都兼带有文学史书写以外的目的。

可见，菅谷军次郎想要写作的，是“专门的”汉诗史（4）。也正因此，他在本书开篇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时，以“至今以来的汉诗史研究和汉学的传来”为题，明确地将汉诗史作为研究和书写的对象。从他的回顾中可以看到，所谓专门的汉诗史，除了需要将诗人、诗作这些基本的材料按时间的顺序组织起来，还需要对与诗相关的背景进行论说。这也是为什么，这部《日本汉诗史》使用大量篇幅记载诗会、诗合等与汉诗创作有关的活动。加上作者在其中对诗风、汉诗评论、音韵学著作等不被过往研究重视的因素的深入研究，使得这些部分的比重超过了对某一阶段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介。综上，可以认为，《日本汉诗史》是一部“专门的汉诗史”，同时也是一部以汉诗为中心的文教制度、文艺理念的变迁史。